

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之二十八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五十八

貴州地方志举要

张新民 著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一九八八年二月

贵州地方志举要

张新民 著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日

封面设计 韩在贤

编辑者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出版者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印刷者	长春市印刷制本厂
出版日期	一九八八年二月
地址	长春市吉林省图书馆
电话	884647

¥ 6.25元

编 者 前 言

费了整整三年多的功夫，这套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上百名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和地方志专家们通力合作，集体劳动的结晶——《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在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支持与具体合作下，其各分册的书稿多已数经编审与修改，即陆续可签付型投入印刷了。

承蒙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同志，中国地方志专家、前辈学者朱士嘉同志为本丛书题签，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王季平同志、中国地方史志专家、前辈学者傅振伦同志为本丛书撰写了序言，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书法家们分别为丛书各分册写序或题签，或慨然允诺担任本丛书顾问，特别是王季平同志和中共吉林省委副秘书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江涛同志、吉林省文化厅顾问李石常同志、吉林省文化厅厅长吴景春同志、吉林省图书馆顾问王化长同志、吉林省图书馆原馆长许鼎同志等对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大力支持，这使我们丛书的编者和各分册的撰稿者倍受鼓舞，大家内心的喜悦之情远非笔墨所能表达，在此，我们对领导和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图书馆界多年以来开展为读者提供地方志遗产的咨询服务工作中的体会，我们感到对浩如烟海的地方志遗产进行分地区的研究，对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鉴于绝大部分的方志遗产是藏在图书馆里的，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于一九八〇年成立了地方史

志研究组，邀请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专家撰写文章，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支持下，于一九八一年十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论丛》。

此后不久，地方史志研究组又提出了将原《中国地方志论丛》的内容加以扩展，使之向具体化，纵深化和有序化的方向再进一步研究、介绍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首先，在原《中国地方志总论》一书基础上，编辑《中国地方志论集》。从我国1911—1983年近百种报刊中收录、选辑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六十余篇，分建国前后两册出版，作为本丛书的总论部份，书后附有1950—1983年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

其次，在原《中国地方志分论》一书基础上提出《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一度曾题为《中国地方志考评》丛书）主体部分的编辑方案和组稿计划。我们的宗旨是：对全国每一省、市、自治区的方志遗产分别编辑出版专书予以深入、具体的评析和介绍；将我国方志遗产作为一个系统对待，通过整体性和有序性的考评，使这整个文化信息构成大厦的阶梯层次和全面结构轮廓，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供有效地利用。一九八二年五月，我们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专家发出倡议，确定了《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各分册的主编及撰稿人。

这一编辑计划得到了全国同行们的积极响应，各分册的主编都真正地尽到了责任，他们或身体力行，全力以赴，或与同仁们鼎力协作。在将本省范围内的全部方志研读一遍的基础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抓住主要特点，评介志书价值，然后撰写成文。根据丛书编辑体例的要求，现在各分册的内容一般皆以该省级现行行政区划辖下的地区、行

署、省辖市（州、盟）为单元立题，有多少地区级建置，即写多少篇考评文章。大体上说，每省级下辖的地区级方志，是以旧府志、厅志、州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未忽略对其属下的县级方志（包括土司、卫所、山川、寺庙志乃至重要的乡镇志）的研究与介绍。每篇文章字数均从实际出发，材料丰富者多写，单薄者少写，力求用宏取精，爬梳抉剔，使这批科研成果在汇编成册时，在本地的方志宝库与读者利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起着一种信息媒介的作用。

本丛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在三年多时间内，我们地方史志研究组的同志只不过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即使这些微的作用，也未能如愿尽责。由于我们人少力单，学浅闻隘，无论在总体设计还是在每种书稿的编审过程中，力不从心和事与愿违的情况，是比比出现的。加之，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遗产分布很不平衡，各分册的撰稿者所下功夫或深或浅，难能一致，故丛书的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为此，尚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丛书初审部份稿件时，曾得到北京图书馆徐文绪同志、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谢灼华同志、首都图书馆冯秉文同志、青海省图书馆陈超同志、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倪波等同志的关怀和协助，我们愿借丛书的出版来表达感谢之情。尤其令我们难忘的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吉林省省长栗又文同志，在他古稀之年任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期间，一直对编辑本套丛书予以关怀，并多次派他的秘书高甫同志向编委们传达他的具体指示意见。遗憾的是，在丛书编辑过程中，栗老溘然长逝。他身虽永息，遗志人间。我们今天仅以丛书的出版告慰前辈

英魂，倘栗老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了。

愚智钝才拙，于方志之学，更浅尝辄止。丛书之议，初仅为方便读者利用，殊料区区微旨，竟至滥觞。忝为编者，诸同志嘱我将大家心底的话写出，唯唯录实而已。所言极浅，更难免出乖露丑，尚祈专家教正是幸。

金恩晖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

DC40/03

目 录

第一章 概 说

- 一、贵州地方志的起源…………… (1)
- 二、明代的贵州方志…………… (4)
- 三、清代的贵州方志…………… (8)
- 四、民国时期的贵州方志…………… (13)
- 五、结 语…………… (16)

第二章 省 志

- 一、(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 (19)
- 二、(嘉靖) 贵州通志…………… (22)
- 三、(万历) 黔记…………… (26)
- 四、(康熙) 贵州通志…………… (30)
- 五、(乾隆) 贵州通志…………… (33)
- 六、(民国) 贵州通志…………… (36)

第三章 府 志

- 一、(嘉靖) 思南府志…………… (44)
- 二、(道光) 遵义府志…………… (47)
- 三、(道光) 贵阳府志…………… (54)
- 四、(道光) 兴义府志…………… (63)
- 五、(道光) 大定府志…………… (71)
- 六、(光绪) 黎平府志…………… (77)

第四章 厅 志

- 一、(道光)松桃直隶厅志……………(80)
- 二、(道光)仁怀直隶厅志……………(82)
- 三、(光绪)古州厅志……………(84)
- 四、(光绪)普安直隶厅志……………(87)

第五章 州 志

- 一、(嘉靖)普安州志……………(89)
- 二、(乾隆)平远州志……………(91)
- 三、(乾隆)独山州志……………(93)
- 四、(嘉庆)黄平州志……………(97)
- 五、(道光)永宁州志……………(100)

第六章 县 志

- 一、(乾隆)毕节县志……………(103)
- 二、(嘉庆)桑梓述闻……………(106)
- 三、(道光)安平县志……………(109)
- 四、(光绪)天柱县志……………(111)
- 五、(民国)都匀县志稿……………(113)
- 六、(民国)大定县志……………(116)

第七章 乡土志与乡土调查报告

- 一、(光绪)安南县乡土志……………(119)
- 二、(民国)定番县乡土调查报告……………(120)
- 三、(民国)石阡乡土教材辑要……………(122)
- 四、(民国)毕节县史地述要……………(123)

第一章 概 说

一、贵州地方志的起源

贵州方志之源，当推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为最早。是书凡十二卷，始于远古，终于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首述巴、蜀、汉中之事，次到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特、雄、寿、势之僭窃，续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李 奎《重刊华阳国志序》）。内容繁富，编次有序，自行世以来，久负盛名。北魏崔鸿谓：“常璩少好学，著《华阳国志》十篇，序开辟以来迄于李势，皆有条理”（辑本《十六国春秋·后蜀录》）。唐刘知几称其详审该博，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史通》卷十《杂述》）。宋吕大防亦云：“蜀记之可观，未有过此者”（吕大防《华阳国志序》）。其南中部分，涉及今贵州地理沿革、民族风俗，可供考究。其书《史通》、《通典》认为应入地理类，《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霸史、别史类，新、旧《唐志》归为伪史类，《直斋书录解题》列在杂史类，《四库总目》载入载记类，章学诚则以为“《华阳国志》非一国记载，又非地志图经，入于霸史（伪史）固非，入于地理尤非，乃杂史之流，限于方隅者”（《章氏遗书补

遗·史籍考释例》），故创名类为杂史方记。从体例上看，《华阳国志》熔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炉，已是早期成体方志，对贵州后世地方志书及其他杂史专书的编撰，有很大影响。

隋唐时期，贵州行政区划，屡有变更，“经制”，“羁縻”，相互推行，时复废弃，但云约束，就全国性的总志言，隋炀帝大业年间，内使侍郎虞世基奉敕撰有《区域图志》一千二百卷（详《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大业拾遗记》），“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城邑”（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此后，历代续有纂修，然如“乐史《寰宇》、希先《方域》，卷帙浩繁，于黔独略，则典籍难稽也”（阎兴邦康熙《新补贵州通志序》）。

隋唐时期的区域性方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唐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图经五年一修，与版籍同上尚书省（见《唐会要》卷五十九“职方员外郎”条及《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

宋沿唐制，“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图经大盛，遍及南北，边远地区，也有修造，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南方经济、文化都有发展，地方图经渐向门类整齐，体例完备的正式方志过渡；而贵州土地的垦辟，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和教育的提高。如播州首领杨选，“为人嗜书而下士，推择知名士为塾师以课子，闻四方贤士，辄不惜金币以迎，岁常千百数”。选子轼，“尤留意艺

文，蜀士无贤不肖，人人以为亲己，于是受廛宇下者，结轸于道，轼后先为之结庐授田，由此蚩荒子弟，多屈首受书，以功文艺矣”（宋濂《扬氏家传》，见《宋学士文集》卷十一）。文化风气的开启，必然影响方志的编纂。考《宋史·艺文志》载有《思州图经》一卷，《珍州图经》三卷，《大明一统志》引有《遵义军图经》，这些就是贵州开创性的地方志书。此外，郑樵《通志·艺文略》有《梓州路图经》六十九卷、《夔州路图经》五十二卷，《蜀中广记·著作记》著录李国纬、刘德礼等撰四种《夔州图经》，《宋史·艺文志》有《南平军图经》一卷，《舆地纪胜》卷一七八引有《黔州图经》，遵义“于宋在夔、梓、南平属中，为编载所必及，论地图为古”（《遵义府志》卷四十八《旧志叙录》）。黔州所辖，亦包括贵州北部及东部一部分地区，都是有关贵州的地方志乘。

宋代出现的几部贵州开创性地方志书，尚局限于与中原交往较多的部分先进地区，数量少，品种寡，其体例都是“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玉海》卷十四《祥符图经》条引李宗谔序），即图文结合的图经类方志，从这些图经辑录的部分佚文看，主要记载民情风俗、地理沿革、山川形胜。门类尚少，内容亦较简略，尚是未定型的方志。

元兴，以统治漠北诸部落的成法，移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授以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诸名号，使其世守厥职，服从号令。为了加强统治，了解和掌握各地情况，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即号令督促各地修志，并于至元二十三年（公元一二八六年）命秘书监虞应龙纂修《大元一统志》，二十八年（公元一二九一

年），成书凡七百五十五卷。成宗大德七年（公元一三〇三年）又命孛兰 盼、岳铉再修，成书一千三百卷。全国大规模地修志，必然促进各地修志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贵州方志成书的有《顺元路安抚司志》、《贵州宣慰司志》、《镇阳凤土记》、《黄平府志》诸书，不能确定年代，而大致可推定在元末明初编纂者，尚有《贵州志》、《金筑志》、《遵义郡志》、《播州宣慰志》、《永宁州志》等（以上诸书都为笔者考证所得，此不赘述）。这些方志虽早已散佚殆尽，然从名目看，可知地记图经成份已大削弱，内容体例渐趋完备，反映新型方志在增加，编撰地区在扩大，为明清方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明代的贵州方志

明代建立贵州行省，是贵州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载：“洪武十五年正月丁亥，置贵州都指挥司，令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永乐十一年二月，“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顾）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明史》卷三一六《土司传》）。永乐十五年三月，又设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见《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五）。贵州自此三司并立，结束了分隶于云南、四川、湖广三行省的分散状况，成为直隶于中央政权的全国十三布政司之一。

贵州行省的建立，对加强贵州与封建中央王朝的联系，促进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交往，

起了积极的作用，修志方面，明朝因纂修全国大一统志，颁发修志条例，“分遣礼部职员，偏行诸司，搜访寰宇文献，缮写进呈，爰备述作”（沈勛永乐《普安州志》序，原书已佚，序载嘉靖《普安州志》卷首）。贵州作为一个独立的行省，迫于功令，自得依例行事，敦促各府县，“采辑山川风物，列款奏报”（蔡懋昭万历《思州旧志》序，原书已佚，序见曹申吉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二《艺文志》），以备纂修省志，上呈礼部参考。故终明一代，修志之风寝盛。如《思州府旧志》即贵州置思南府建省后，首任知府崔彦俊于永乐十五年“奉命采辑录成，差老人谭祖庆进呈”的（郭子章万历《黔记》卷十四《艺文志》）。因此，自上而下，督促甚紧，各地编造志书，体例一准朝廷颁降修志条例。永乐十六年，沈勛修《普安州志》，即因“累檄切督，固辞弗可，于是旁搜幽讨，溯流寻源，或稽证于他编，或索遗于重译”，始纂定成书的，其体例亦“悉依颁降条例书之”（沈勛永乐《普安州志》序）。永乐以后，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历朝续有纂作，至万历达于高潮，天启、崇祯两朝，值明末社会动荡，边事扰乱，然仍有续作不辍者。终明一代，仅省志设局官修者，即有四部，其余各地纂修的府州县志，达六十余部。贵州布政司所领府县，大部分都纂修了志乘，其中铜仁、石阡、思州三府先后两纂。镇远、思南两府先后三纂，黎平府、普安州、普定卫竟前后四次修造。

随着明代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汉族大量移入，一些著名人物如王阳明、邹元标的贬谪贵州，昔人不经意的蛮荒边徼也引起了有识者的重视。贬谪和宦游贵州的文人，或题咏山水，或发为专文，撰成专著。如明天台王世性，游踪颇

阔，凡“足版所到，奚囊所余，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宸国策，里语方言之贻”（王世性《广志绎》自序），多笔札为文。其《广志绎》一书，“搜考遗佚，风会、物产，一一详核”（曹溶《广志绎》序），其中卷五《西南诸省》部分，即据身所见闻，实地考察而成，后人摘出贵州一篇，录为《黔志》一卷（《学海类编》本、《黔南丛书》本），足资考证。贵州巡抚郭子章，于平播戎马倥偬之际，辑《黔记》六十卷，“雅有法度，为世所称”（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艺文略》），此外，亦有本地人潜心究学，发奋搜讨乡邦文献，辛苦历年，独力任之而终有成者，如黄运昌、谭瑞均分别撰有《黔记》，惜未流传（参见拙作《明代私撰六种贵州省志考评》，载《文献》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明代的贵州志乘，大部淹没难寻，从现存的四部省志和两部府州志看，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以府、州、卫、所、山川、人文分类为编，虽以“图经”名目，尚有各不相通，悬越难合，义例未精，考据失当等缺点，然合一方天文、地理、历史、人物、文献于一书，已粗具省志规模。嘉靖《贵州通志》是第一部以“通志”题名的省志，分类以事为编，纲举目张，门类繁多，较弘治《志》详赡，而体例大备，惟“以孝义隐逸别于人物之外，而如陆京、张伯安诸人，又以孝友入于人物”（《四库总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四“史部地理类存目”），甚为失当。反映贵州方志的编纂，在明代前期尚未完全成熟（参见拙作《明代官修四种贵州省志考评》，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万历时，方志纂修达到高潮并趋于成熟而基本定型。万历《贵州通志》兼取弘治、嘉靖两志之长，或以府州卫所分

类为编，或总述兼制经略以相联合。郭子章《黔记》纪传表志诸体俱全，一如正史，其中《大事纪》为前志所无，而此志首创，述事略远详近，简洁有法，时人称之，“黔之故实，厘然指掌，虽黔人不稔也”（丘禾实万历《黔记》序）。后此贵州修志者，多递相祖述。传申事纪所未究，详于人物史事，“虽名公巨卿，亦只载黔事，不及其他”（万历《黔记》卷三十《江东之传》所附“螟衣生曰”），矜慎而得史法。反映明代中叶，贵州志书已由宋元图经过渡为体例完备的正式方志了。

明代府厅州县志，现存的仅嘉靖《思南府志》、《普安州志》、万历《铜仁府志》三部。万历铜仁府志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笔者尚未经眼。《思南府志》八卷，以地理、建置、田赋、祠祀、人物、拾遗、诰敕八志为纲，分统众目，“色色具备，井井有条”（张烈嘉靖《思南府志》后序）。《普安州志》十卷，分舆地、食货、学校、兵卫、祠祀、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杂志十门，名目略有不同，门类则稍多于前者。两志虽尚简略，然明物、记人、载事，诸体具备，条贯整齐，已是早期定型方志。佚亡而可考者，如张守让万历《镇远府志》，“首舆地而次营建，列食货而继学校，载官师而人物、节孝、文艺、吏治、户口、选举、灾祥、风俗，以次胪列，若指诸掌，事核文实，例严裁当，称信史矣”（何天麟万历《镇远府志》跋，载卫既齐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四《艺文志》）。袁表万历《黎平府志》分舆地、建置、官师、征输、秩祀、文献、边圉八志，又述厥故事，附以论著，凡九卷三十三篇（此据袁表万历《黎平府志》序，载《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黎

平府部艺文”)。与嘉靖两志相较，门类略有增损，内容似更完备，反映明代中叶，贵州府州县志也基本定型，并为清代修志的空前兴盛，准备了条件。

三、清代的贵州方志

清代是方志纂修的鼎盛时期。就贵州说，疆域基本确定，“改土归流”大体完成，地方相对安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志的纂修，自然普遍起来。诚如贺锡藩所云：“风会既开，宜有纪焉！”（贺锡藩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序）

清王朝入关稳定后，须了解地方情况，以决策施政，巩固统治，康熙十一年即诏令纂修通志，绘制地图。二十二年，又“命省郡各绘图以进，且悉其境内之名山大川焉”（陆世楷康熙《思肠志略序》，原书已佚，《序》载蒋深康熙《思州府志》卷首）。于是“抚宪檄下所属有司，采集编纂，将以汇成全志，上达御览。”（何缙康熙《黔西州志》序，原书已佚，序见乾隆《黔西州志》卷八艺文）。及西陲底定，再次“命臣工重修一统志，曾奉部牒咨查各省部邑志书，采风型俗，教典明礼，备一代之掌故也”（胡章乾隆《清江志》序），台省大臣复“转檄郡邑，新旧志悉充采录”（万齐寿同治《石阡府志》序）。贵州各地修志，同于内地，奉为故事，蔚成风气。有些地方官吏，把修志看成任内职责，有的官吏纵然学识低劣，也要附庸风雅，招聘博学能文之士，启馆纂辑。于是官修私撰，种类繁多，数量丰厚，超过前代。

清代官修地方通志，前后凡三纂。康熙十一年，清王朝颁发贾汉复纂《河南通志》为天下式，诏各省督抚聘集儒